

当代论坛 / 刘光炎 · 一 no. 1 (民国32年[1943]5月)
~[?] · 一重庆：联合文化编译社[发行者]，民国
32年[1943]~[?].

; 26cm.

半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16毫米，缩率1:20。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摄制；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北京）。原件有污迹，破损，回皱。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13 1943. 5 ~ 12)

建設之條件

★本期要目

經濟要道
由來條內閣改組看日本動向
國際的新舊分合附錄五本論文
戰後世界通貨問題
自由主義派與資本主義經濟問題
坐井觀天談
蘇聯農業問題
趙萬里
羅瑞卿
伍晉元
顧英士
余家菊



當代

建設之條件

余家菊

論

我國由六年的抗戰建國同時並進的時代，今後將步入於專力建國的奮進中，所以全國朝野當今皆頤其注意於建設問題。我國在今次戰爭勝利之後，將猶有一個相當長久的時間，是我們國家的力量尚不足以絕對保證國家安全的時期。我國家經過此一時期的過渡，要看各種建設成就的快慢。所以國人對於今日的建設事業，當視同生死攸關的活動，而用危懼警覺的心情以相從事。

建設當然須有建設的靈智，如物力人力技術之類，皆缺一不可，而且須加以精當的利用，凡此，都是擅當設計劃責任的人士所苦籌結的。我所謂的建設之條件，即是超越於技術問題之上，而為進行建設時所必須先已具備的情況。近代的中國，雖無整個的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建設活動，而各地區，各時間實辦的，單營的建設事業，實不斷的興起。其所以無濟於保國保種的大業，似不能不說是由於建設條件之不會具備。建設的條件為何？第一是國權的獨立。我國的浩大犧牲使抗戰繼續六年，使世人括目相看。列強亦以平等相待，國權當不復受人牽制。但是今後世界局勢的發展，殆將趨向於國際合作，合作必與分工相偕而來。國際合作局勢中必將於各國之間，創立一種分工安排。此種安排，欲其無害於國家之安全與發展，須用精巧的技術，尤須有維護國權獨立的勇氣。在技術上，須有一種適於今後情勢的國防方針，更依此方針以製定最小範圍與最低限度的軍需建設與經濟建設。超此而上者，可與各國合作，在此以內者，必須力求獨立。對外計，則與各國之間，要當秉此方針，以決定對於行使國權之各種約束或加接受，或予拒絕。而在國民精神上，尤須堅持明目標，其求國防獨立，經濟獨立，與技術獨立，能獨立之程度愈大，則所恃以與人合作者乃愈多。以合作之名，為依存之實，是國族生命的最大危險。

建設的第二條件是統一。抗戰勝利以後，統一似不成問題。其實我國民由傳統的集體，要求統一，為人心之所向，有遠比此一要求者，必將見棄於國民。統一要求的實在力，殆不可抗。惟是統一之精義，不在置每一國民的行動於一個單一的模型之下，乃在使每一國民的活動於

有利國家之大前提下，各種發揮其最大的效果，個人得以感發生活的活力，即時發揮其靈氣的發揚。快快大聲地為勸進點點擊成。光音響，單一的聲音，單一的色彩，不能起人美感，其能與起美感者，必以形式的幾何方圓結合，各種色調的彩色互保調和。各種有內體，都是說一起，不統一，不能成為生物。何況國家？但是生物的音效不同，則其性亦各異。所以統一的原則，乃是謀求於統一之中。其次所謂統一，不僅指強力所可造成之外表的整齊而已，其要素乃為國民精神的統一，勿使有私心之念，則不能圖之于統一；政府而能使人人都說。愛子報母，往由於極端保護過度，使爲子者馬首干涉預規，意志不能逕行。所以政府和社會要求人民的行動，合乎正義，順乎法度，可托其自然發展諸則聽之。如是者，可謂爲天朝的統一。如此，國民乃能統和。

建設的第三條件爲清明。國權獨立，能執行自定的計劃；國家統一，有安定的秩序；然後始能進行經濟活動。經濟活動，必須清明，始得發揮效率。清明是素亂，昏暗，污濁的反對。業務有條理，人事有序，財物無侵盜損耗，是謂清明。清明條件不具備，建設雖能收效，亦必阻礙的無有效果甚遠。欲得清明，自必施行法治，按照功過，信實必罰。賞罰不行，則人心怠懈，賞罰不明，則人存苟撫。總究有所賞罰，欲人人心悅，以收普遍的廣泛效果，其事所屬無望，甚且粉飾以希賞，敷陳以逃罰，致或上下相勾結之局。所以外力的清正，即可用爲本身的助力，而根本之圖，要在使當事者明瞭建設之成敗爲國家存亡所繩，子孫莫不知所繩，各各盡致天良，清白方躬，以奮勉從事。同時，又使國民普遍了解此一旨趣，用輿論的監督力，使在事者知所畏忌，庶幾清明風氣可成。君子之際，請勿耽於財物貪得，既忘於其情，又微喪其心。

建設的第四條件爲真實，尚實即是奉行眞理。眞理爲何？雖說見仁見智，不必相同。但是實際上人生之所應趨避，可說他出並不無殊。譬如宣統一以及清明之必要，除成見太深者外，想亦無人否認。國民能奉行眞理，國民精神始能充實堅定，以趨向於改善奉行，諸君莫作。清明知眞理在此，而所行竟與相反，是爲明知故犯，是爲心死，是爲一切墮落之根源。獨立之追求，統一之擁護，清明之尋取，皆賴政治，亦可讓人民便易其識。待人的態度，亦不可使對方不敢流露其實。

苟真的要識，爲人人說真話，說實話，似乎容易，其實甚難，似乎細碎，其實龐大。世人對於在己之上者，大率遜迎。對於與己同列者，大率敬仰。對於在己之下者，大率謔謔。人情喜與人和順，不喜與人齷齪。入情又大率好惡異。所以善於處世的人，每對於不曉對方意旨轉言，必須約束自己，使自己虛心傾聽自己所不願聽之話。自己所不願聽之話，未必皆真，但欲使自己所聽之話，即須自己自說其話，令其意之話。在講，發言發底，平鋪一律，思慮不周，既可憤，而上下交相欺則尤可危。所以軍事化運動甚爲有益，但將軍軍令狀式的命令傳達，一切建說，皆當以精神建設爲其基礎，國人今日已應當接受其說。惟是精神建設之項目應何如，則頭緒繁多，固人所見，或尚未能一致。

一切建說，皆當以精神建設爲其基礎，國人今日已應當接受其說。惟是精神建設之項目應何如，則頭緒繁多，固人所見，或尚未能一致。不然，則歷代聖賢之教，其或謂或無何以時有起伏。

經國要道

周德文

目前中國的重病與急症

說個比方。中國是個病人，而且病不單純。病在五官。病在四肢。如不說疾忌醫，不妨說滿身是病。「病急亂投醫。」有說中醫好，有說西醫好。有說針灸可以起死，有說符咒可以回生。外科內科都用得到，和中道士也請過。術士迷信的治療方法，即使不說，畢竟是各個大夫的主張意見，也就「各執一詞」「言人人殊」。眼科醫生說眼睛瞧不得。耳科醫生說耳朵聽不得。肺科專家說肺病要當心。腳科專家代說脚病也不輕。喉科大夫則說喉病最嚴重。有的主張心理治療。有的主張衛生第一。甚而至於有主張運動強身。

其實呢？大家的意見都不錯。起碼爲了病家無所適從。如些各種療法，同時並進，固有利成，亦有相剋，對病人未必真有益，何況所費太多，負担不易，「巧婦難爲無米炊」，爲了無錢買藥，又要納人草稿文章，賣點稿費，甚或打算出賣病人以換寒的棉被。這辦法不能算但是「一腳踏空地」，「隔岸是一把肉舖頭」。歸根說來，大家對於病人都關心至極之心太切，因而難免分不清緩急，忽略了嚴重。

目前中國最重要的病是什麼？是敵人的侵略。回生之術在乎爭取抗戰的勝利。即所謂抗戰第一，勝利第一。如果這病不醫好，病人就會一病終正腹。即使把它四肢五官醫得十分健全，也屬枉然。此所以醫前唯一的重要，是爲了國家民族的生存，集中意志與力量，以求抗戰的勝利。不過這不是說，在「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之下，其權威設可以不求改革。但有兩個條件，一是改革應該的重要目的在乎促進勝利的獲得。二是必於爭取勝利而外還有餘力。這兩者我認爲這病已經拖了六年，並非難治。因爲這裏最根本的就是世界戰爭的性質，它本身不能決定最後的勝負。每當大日本在小日本最猖狂大舉動的時候，時人每以日本將用盡力解決中國事件爲論。我却認爲不以爲然。敵雖強盛，也須明白，今日的打到了東北「中國事件」上，尚不能解決。同樣的，在今日，我們卻使着力反攻，克服南京武漢，進而轉到建國，固與抗戰並舉，其間實有輕重之分。抗戰的最重

•場元也許是治病的根本方法，至少應當有每而無害。可是如果要醫到四千度的病人，起來散散步，吸吸新鮮空氣，那未免「愛之而害之」。這是對抗戰建國的認識。在這一認識之下，數年以來，開始主張「減政」。有些機關的維持，應當審慎減低到僅在「零」。我自數年來的事實，進而至於想「精兵選正」，已提出我一向不喜歡的一「無爲政治」。所謂無爲，不是說任何事都不做，祇是說不與抗戰無直接關係的事。譬如點說各種產業應視其對於抗戰的重要性而量力次第興辦。三年前，我在濟寧大公報上，也曾說過：「就是生產事業，如果眼見得在抗戰期間不能收效的，相當等等再說」。因爲中國的病本多本重，人民的力太少太弱，我們籌集軍力量來對付最重的病，把其他的病置擱一旁，也可說謂其他部份休息一下，這樣由除了人民的力量以外，還有一點可以補充。就是我們的基督教政治機關之不健全，往往一遭禍國禍民的政令，壞了民間，變成了禍國禍民的工具。在此狀況之下，始不主張「無爲」，亦當主張「簡政」。惟能如此，以上是說目前中國最重要的病。現在再說目前中國最急的病。那就是物價的膨脹。也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全會以及近兩年來，委員長主持一再指揮的「經濟第二」。第二祇有一個。勝利第一與經濟第一相衝突。實則前者是指第一重。後者是指第二重。爭取急不同。急者誰多誰少，重者未必急。抗戰勝敗關係着國族有亡無所以這是第一重病。這病已經拖了六年，並非難治。因爲這裏最根本的就是世界戰爭的性質，它本身不能決定最後的勝負。每當大日本在小日本最猖狂大舉動的時候，時人每以日本將用盡力解決中國事件爲論。我却認爲不以爲然。敵雖強盛，也須明白，今日的打到了東北「中國事件」上，尚不能解決。同樣的，在今日，我們卻使着力反攻，克服南京武漢，

，這對敵國當然是一嚴重的打擊，但仍說不上最後的勝利。這不單說我們可以不努力，坐觀世界局勢的演變。而是說我們應該格外努力，但一切行動却必須配合同盟國的整個戰略。最近蘇聯同中國將軍中國為反攻日本的根據地，我不相信這一軍事秘密會在報上宣傳。如果真有其事，我相信軍事專家必會估計到，我們的友邦不在海上打擊敵艦，欲在陸上驅逐敵軍這種戰略的軍事價值。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大家深信無疑。抗戰之病雖重，金治可操左券，近一二年來人們希望戰事快結束，這不是因為嫌戰，是受物價的過份威脅。如果物價不威脅人們的生活，戰事再繼續半年二年，大家一定甘之如飴。所以我說目前的物價問題，是中國的第一急病。因爲是急病，就得儘先醫治。長此拖延，會使在握的勝利，不復收

於軍事，而失敗於經濟。所以我第一個意見，即主張：「過去是軍事爲主，經濟爲輔，我們要拿經濟力量來支持軍事。今天是經濟爲主，軍事爲輔，我們要拿軍事力量來維護經濟」。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如果這原則是對的，那目前的軍事經濟政策，就有許多是需要重新考慮的。我們應當意會，不復明言。

爲了挽救急病，甚而至於把重病都暫時放在次要的地位。其他各種本屬次要的病症，自然祇得量力次第醫治了。至於一切與急病有密切關係的措施，當然尤須慎重將事。比方說。如果政府認爲目前物價高漲是與通貨數量有關係，那就應當毅然決然在任何狀況之下，不使通貨更趨於膨脹。近兩月來政府對於限價政策，真是「雷厲風行」。這一方面說明物價問題愈加嚴重，另一方面說明政府的限價政策更加嚴厲。不過限價政策的成敗，除了注意限價的技術以外還得注意限價的精神。即在限價政策之下，凡有加價作用的任何措施，都得避免。這是又

總 要

現在祇就中國當時的財政政策，再講一以軒其他問題。自從抗戰軍興以來，國家收入減少支出增加，數年之來，確實經過了財政當局。巧婦不能無米飯，財政當局不能不力謀擴攤財源以應顧大的支出。通貨膨脹的產物過大，開支公債又難不濟急，「增稅以取收民間的購買力」，遂成「康莊大道」。但增稅而不影響物價（增加物價）者幾希。政府往往爲了增興一種新稅，設立機關，調撥人手，行政費用，已經不貲，結果幾有一些收入，而在財政當局之因爲得計，但就物價問題而言，得失尚待討論。恐怕到頭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使政府難於應付。故我以爲「政府爲了增加收入，與其增稅（包括增辦新稅與提高稅率）不如整稅，即整頓稅收，政府能够辦到敵防漏稅，嚴禁中飽的地步，徵力當已不少。」總而言之我們得明白認識目前中國最重的病是敵人的侵略有最急的病是物價的威脅。在這一認識之下，財政政策除了極可能制訂緊急借款以外，在國內底本規模的發放公債。縱然有掛漏，難免有冤枉，筆竟是少數，既無害於重病，且有益於急症。我始終認爲這是目前中國的理財大道。如果不此之圖，而欲藉增稅方法來增加收入，（我想沒有大會主張用增鈔方法來增加收入的），則恐開達「破例」（羅綠亞齊斯著的一段名言，以爲本文的結束。「國家始而放私稅以誘惑偷盜，繼復制嚴刑以懲處偷盜，俄驕怒之大小，定酒禁之輕重，莫不外乎物價的飛騰。」）政策。如此，其他政策亦然。目前新聞報道，某項政策之被稱爲敵人的侵略是中國的第一重病。

物價的威脅是中國的第一急症。

術統整齊對症下藥。

由東條內閣改組看日本動向

萬德植

西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東條英機內閣被改組，以重光葵任總理大臣，安藤
忠雄任內務大臣，吉田茂山崎達之輔任農林大臣，小東條自華文部大臣，大
庭唯男任無任所大臣，矢矧基二任情報局總裁。二十一日東條解除文
部大臣職，以國務長官兼任文部大臣。我們由這種內閣改組，可以略述
國內情勢，對外動向。

蘇寧十月申，東侯吳越王現後，明大將總戰內閣，自禁陪相國，
內相兩要職，其餘各屬臣均係三司等人物，絕非粗賤非常時國務之經
辦。一般評論家多認為東侯不孚人望，第一流人才不願入閣，故以三司

等派色方勢，其後遂是東條派定以西進爲孔方，以擴張軍事為目的，而邊境地帶佔食大極，議事聯繫力以侵奪人權時，而得決定冒險政策。據此本應代內閣之勢非前相模有人望有手腕，若閣員聲望太高，往往都荀妄張，各不相下合而變內閣屬於支離滅裂，終致一事不能決定而輒亂命，如近衛第一大內閣，即其最著之例。而近衛第三次內閣，因有立交治，亦欲重開冒險政策，無法藉快營行，東條專鑑於此，故以三原派色高齊賜與人數，而自己乃得實行獨裁，卒領導日本走上亡國之路。

滿洲全日本，到今年一月中何議會休開會的時候，聞敵軍界老人嘆息曰：「如君無法打破難關，應早退避，以避他人得以樹而收拾時局。」蓋這一質問，無法回答，所以左議會開會前，突然稱病，延期一月，經東條與軍期討論後，回答高老丈，大致謂彼願再待一年，求取最後勝利，如仍無法解決，則讓他人來辦。所以議會開會後，一條則高唱：「今年為決戰年」，這是東條把回答各老人的話，再宣會聲地而已。

議會閉會後，東條席不暇暖，既訪南京威靈宮又訪長春櫻園，雖然不可終日，為決戰之準備。無如人望已失，要以原有班底，點觀眾，殊極困難，所以有局部改組內閣之必要；並以對各方略為難，希圖交換其贊助，以保維持一時。觀這次新閣員中，如山崎達之，與大藏野男，為舊政黨人員，這在觀眾人如洪水猛獸之年前，勢必大讓步。而同部長某，則為資政院議員，亦轉分一開端。這說明一條如何希望與舊勢力妥協，以求苟延殘喘，而完稿其使日本亡國之使命。東條經這一次改組，而其獨裁權力，較前削弱，尤其氣餒不如。

議會閉會後，東條席不暇暖，既訪南京賊黨，又訪長春撫署，惶然不可終日，爲決戰之準備。無如人望已失，要以原有班底，既觀衆，殊極困難，所以有局部改組內閣之必要；並以對各方略爲讓步，希圖交換其贊助，以便維持一時。觀這次新閣員中，如山崎達之、與大庭勝男，爲舊政黨人員，這在觀衆人如洪永鑑等之領袖，雖大譏謔。而鶴部長景，則爲貴族院議員，亦得少一開痛。這說明一條如何希望與舊勢力妥協，以求苟延殘喘，而完竣其使日本亡國之使命。東條經這一次改組，而其獨裁權力，較前削弱，尤其氣餒不如前，這是世人不難發現的。

東條英機向英美開戰，最初數月，因用軍事擊敗于蘇聯得局部勝利，又據臺灣宣傳之能事，一般人民當然不輕說話。其後珊瑚海一敗，擊沉巡洋艦「瓜達基尼爾島」，敗於歐文麥丹萊四敗，一般人民已感影響，不耐，加以與英美接觸，數千吸收英美自由空氣之人返國，戰爭真至情形，既為日人所深知，尤覺美國生產力之突飛猛進，亦隨之警懼，而且人對於戰局更燃燒灼，至去年十一月中旬，鳳島海戰又遭

之喪失，敗北後，喪失財物，於是連同空氣支配公司，連同市場開始
被日本獨占。而這有鑑於大戰之後二十餘年間所未有。這不是說
其之操縱，而是說大日本帝國之在中國市場之操縱。於是反東條空氣

據此以觀其勢，則知其必有圖謀。而其圖謀者，一曰滅我，二曰滅清。滅我者，則謂國方而清剛，雖外相，而內尤爲強，說之甚危，即何如重光變卦之辭哉？而清果何爲從師之圖？惟無以解也。但猶賴頤樣，據場。

第二用重光，對英美亦有重大陰謀。即英美人士也只知從前的重光，而不知已變質的重光，以爲重光出征外相，日軍閥滅者有一種「和平」政略，因些可以辦妥英美之小部分失敗主義者的戰意。試觀重光一登台，美英報紙即紛紛作此種推測，可見一斑。這類陰謀，經美、國務卿赫爾重申軸心必無條件投降政策而失敗。但重光之意，並不注重目前，而注重將來某一年期。即在日本發動某一大戰時，行爲，即獲得某種程度之戰果後，再藉偽和平派重光之名，以施行某種陰謀。這類陰謀也是德國所日夜求之者。所以目前之失敗，東條並不在意。以上二者，是東條起用重光之積極作用；而消極方面亦有作用。即東條內閣的第一個外相東鄉，當日本要與英美作戰時，希望穩住蘇聯，所以在七十九屆議會聲明：「日本與蘇聯之國交，依然以中立條約而規律之」。但到去年德國對蘇發動攻勢後，日本即躍欲試，東條對蘇聯，不致爲日本之一束縛，所以東鄉贏得不貲，而由東條暫掌權，其後由谷正之繼任。但德國對蘇攻勢失敗，繼之以史達林略動的大戰，載行無事之部隊降旨，擬用本篇爲之榜書，所以谷只得又重復聲明，中立條約開始，谷正之的聲明，又有問題，所以谷只得與重光對調上，以便無拘無束的重光易於發揮。試看重光見台後的聲明，即根本不提蘇日中立條件仍然有效。但今後東條要決戰，這一決戰當由撕毀蘇日及蘇日關係，而蘇日中立條約，自然地棄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亦是重

羌禦各封國的主要作用之一。

最後調發安藤紀三郎之任內相，亦非無注意。當東條組閣時，就決心發動戰爭，所以身邊內相了以便指揮憲兵警察，從事防空。其後空襲危險減少，所以讓出內相一職，由文官湯浅擔任。現在既要「決戰」，當然須忍受嚴重的空襲，文官湯淺不能担负這繁重空襲軍事的內相，所以須由陸軍中將，且會任意兵司令的安藤擔任。這與東條自己

國際的經濟分工合作為和平基礎論

錢端升

獨立永久和平或消弭國際戰爭之道有治本與治標之分。治標之道不外懲治侵略國家解除其武裝，使向之好戰者無從發動戰爭，並規定緩和的辦法，輔以必要的工具，使國與國間發生衝突時，得有化干戈

為玉帛的機會。治本之道則在如何根本消滅國與國間衝突的源因。

國與國間衝突的原因甚多：大別之，財不外政治的與經濟的。在商工革命以前，政治的原因遠較經濟的爲普遍，亦達極重要。在商工革命以後，適得其反。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政治的原因幾除了經濟原因的附屬物；沒有經濟的因素存在着，單單政治的因素多半是不能成爲戰爭的動機的。南非之被以英人察爾努力，侵入波爾諸邦所致。日俄之戰由於兩國之爭東三省及遼寧，第一次大戰的原固較爲複雜，但主要的即爲德之求爲世界第一強國，求增加領土，並控制國際貿易。此次大戰的原因更是複雜，如稍加分析，則經濟的背景，無疑地站在很顯著的地位。日本之侵中國乃以佔有中國的人力物資爲目的。德國之侵奧匈帝國同目的。中國之欲擊敗英國而在該殖民帝國與大和主義將隨這次的大戰而消滅，但經濟的民族主義是否也能隨而消滅，是另一問題。如果不消滅則對待的民族縱使在未來不至流爲德日民族近乎那樣的狂戾，戰爭仍是無可避免。蓋經濟的民族主義總是在一個反博愛及不信任他民族的根本觀念之上，因爲不愛他民族或愛不如愛己貴賤之故，奉行經濟的民族主義者每知有己民族的輕視，而不知有他民族的輕視者，無論於提高己民族的生活標準，而不期地令其生活標準的低落，因爲不信任牠民族之教，奉行經濟的民族主義者更偏於己民族之自給自足已民族經濟之獨立發展之無所取於人或寄於人，而不知牠民族之莫能自給自足。蓋民族

兼任有同謀蓄義，即在空襲時，可以指揮憲兵警察，從事防空工作運分，這是一個重大措置。

我們由東條改組內閣的人選看，對內讓步，因在獲得全國之支持，以便實行另一月俸政策；而對外尤其在關於發動空襲政策，影響相當。所以我判斷日本的第一重大冒險政策，已有將在陸上之勢了。日本所需要資源與可爲德人增加產出的人民，則德人也失了造攻波蘭的重要引誘。

無疑地，民族的衝突是近代戰爭的主要原因。但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尚不是這一點，而是另外一點。這是近代民族主義的表現往往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最極端最瘋狂的民族主義無過於德國的國社主義與日本的大和主義。他們固然均有併吞四海臣服異族的野心，但他們的方法無非是經濟的侵略，而他們的最後極的並無非是利用其族的人力與舉世的物力，以滿足他們自己的經濟慾望。他們最喜歡在島嶼或島嶼地帶內的設施可爲明證。

國社主義與大和主義將隨這次的大戰而消滅，但經濟的民族主義是否也能隨而消滅，是另一問題。如果不消滅則對待的民族縱使在未來不至流爲德日民族近乎那樣的狂戾，戰爭仍是無可避免。蓋經濟的民族主義總是在一個反博愛及不信任他民族的根本觀念之上，因爲不愛他民族或愛不如愛己貴賤之故，奉行經濟的民族主義者每知有己民族的輕視，而不知有他民族的輕視者，無論於提高己民族的生活標準，而不期地令其生活標準的低落，因爲不信任牠民族之教，奉行經濟的民族主義者更偏於己民族之自給自足己民族經濟之獨立發展之無所取於人或寄於人，而不知牠民族之莫能自給自足。蓋民族

主義的出發點，僅可是求和已而不求人，不以有一點戰爭的意念。然而如果舉行此主義者不限於一個民族，則勢必先期發生利害上衝突，再則因衝突而爆發。既欲備戰則必須更求民族經濟之自足自給。愈求自足自給則戰爭愈不可免。戰爭與經濟的民族主義乃相互為因果，成爲莫可分離的現象。故奉行經濟的民族主義者儘可不存日本統治階級及希特勒的狂妄野心，但流演所極，也許有不爲太和主義國社主義之證者。

經濟民族主義的危險性，今代人士已漸多明瞭者。如經美國威爾斯總統的和平言論，我們不能窮見他已深知這主義與戰爭之不可分離性。羅斯福及赫爾等則對此點尤多發聲。赫爾歷年來所持的外交政策可說是建築於國際經濟合作的大原則之上。自大西洋憲章成立以來，羅斯福總統與華萊斯副總統同赫爾一樣，屢次強調經濟合作的重要性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危險。然而他們所建議的方法足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麼？我的答覆是否定的。

大概經濟合作之道有六個方面：一是資源的分配，二是國際投資，三是國際勞工政策，四是國際貿易政策，五是國防貨幣及金融政策，六是生產的分工合作。這六個都是很重要的方面，有一個方面成問題，經濟合作也成問題，因為如此，美國英國的政府及兩國前途的經濟家近年來頗知注意於各個問題的解答。關於第五個方面的問題，美財長已有初步計劃發表，美政府也發表了所謂凱恩斯計劃（但尚非政府的計劃）美政府且已邀請各國財長，預備開會作初步的磋商。無疑地，在其他方面，聯合國也還有許多問題，也應有所建議。在這許多方面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六個方面，生產的分工合作是最為重要、最根本的問題。有了生產的分工合作及其他方面的合作是不行的，問題亦不難解決。沒有生產的分工合作，其他方面的合作是不難取的，也是些微不重要的。即較有部分的合作，過去經濟民族主義對時空門的高歌是捨棄不了的。

本來謂生產的分工合作與國際經濟的聯繫不如國內的，原來在工業品與以統一，但各國的經濟都半耕半織的。一地生產一地所需的糧食，

布匹，鞋履，工具，農具，及日用必需之品，只有少數特殊物品則得給於他地，如貴州無鹽則仰給於四川，法北無絲則仰給於法南。工業革命以後，生產的規模既大，生產的地帶亦見集中，於是某一大專生產棉織品，另一種專產鋼鐵製造品，而其他必需品則來自他地。即生產的分工合作。

生產分工合作的原則本不限於國內各地之間，而可推廣於全球各國之間。在十九世紀中葉，經濟的民族主義還沒有如近年的勃發，而國際貿易遲較近年爲自由時，各國之間會有過相當的分工合作。但經濟的民族主義需要自是自給制爲完成主義的條件。故主義愈極行，分工業愈受限制，在第一次大戰以前，化學工業及光學工業是德國的專長工業，也是獨佔工業。但大戰使英美如這兩項工業之需要，於是戰後的英美也有這兩項工業。汽車工業向是美國的特長工業，而德日則仰給於美國及荷印等處。但爲備戰起見，德日在這次大戰爆發以前，即努力於代汽油的提煉，縱成本大於購運，亦所不惜。糧食棉布亦爲德國所缺少。德國數十年來之努力以增加番薯的產量，與夫近年之發明棉布代替品，爲的也是自給與戰爭。這些不過是無數例子中的一個，如果這次大戰的爆發再延遲若干年發生（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各大國的經濟定可進於更自給的程度。

一個民族如準備戰爭決不能放棄自給制，也決不能採行分工制。粗食不自給，則戰時有餉射餉，乃至於人民悉成餓莩的危險。鋼鐵不自給，則軍械軍火將無所用。即些微至潛油亦不能或缺，缺則飛機，艦船，汽船，及一切近代交通工具將無能行駛，而作戰亦將感受無量麻痺。此所以要備戰則必須求自給制的確立，然而十全的自給制。是除了以天下爲一家外，無法確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資源富裕的大國能具備一切的資源的，也沒有一個技術卓越的國家能發明一切的代用品的。要十全的自給，便不能不求一統天下，於是戰爭便不可避免。近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統一，可爲明證。此所以民族經濟自給之制與戰爭相互爲因果，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這兩戰後，各國如不能毅然決然撇棄自給的觀念，而採用生產分

重視私利，財經便戰爭的基礎。國民始真被敵軍，如不合理區界，實則有在於如與族羣心理的滋長，能一時消除或防衛，戰爭的基本本質因之依然存在，戰爭亦仍無可避免，只有改採分工制戰爭才無從發生。蓋在分工制之下，將沒有二個國家能從事於今日的戰爭。缺乏鐵與火財物，則軍械軍火無着。即百物無缺，而命，畢竟而謀戕害他人，由少可能。

生產又將如何分工呢？依我此表戰前的生產情形當然不是分工，那時經濟的民族主義已經風靡全世界，倒退至十九世紀末生產情形也不是分工。那時世上也沒有經濟的公認。一個合理的生產分工定須建築在兩大原則之上。第一，能使一切的民族均有提高生活標準的可能。第二，能使各地的人力與資本最大的利用，而分配的消耗則減至最小限度。我們一面須顧到事實，不能強無為有，強有為無，也不能太過於急進。但我們也不能不看一番有計劃的改進，無論這改進，在目前有多大的困難。

較具體言之，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其生產應求調整，而不須速度的更張，工業落後的國家則應求工業化，而不可強其停滯於農業經濟的階段，單像較小的國家應以專門若干種的產業為原則，單位較大的國家則應以發展大多數都屬於日常必需品的生產為原則。工業較發達的國家之除了苦心經營的如日德外，其產業的分配在大體上已達合乎國情的平衡狀態，故只須相當的調整，而不必多所更張。以英美為例。英國以各種重工業及紡織工業為主要生產產業則居於不重要的地位。除紡織工業因原料距離過遠，向日的市場亦不易維持為適當的緊縮外，其餘似無變的必要。美國以地廣物博人衆之故，生產亦較英國為多方面的。這種多方面的生產，除汽車製造或有緊縮的必要外，似可繼續不多變動。工業落後的國家自然要大工業化，不然則這些國家的小力將多半耗費於農業與輕工的製造，殊不經濟，且其人民的生活標準亦難期有有效的提高。單位較小的國家應以生產專門化為原則，生產不宜從事於多方面的生產者，其確至極。他們地區小而人口少。他

們從事於各式樣的生產，不採為事實所不許，也太不經濟了。單位較大的國家則反是。以中國為例。中國地廣人衆，對若干重要生產，如糧食、如紡織品、如機器業、如化工業，如電工業，凡消費量甚者，自應太過取給於本國，而不賴外國之輸入。如賴外國輸入，則運輸所費將極不經濟。但本國缺乏原料的製造品，中國亦必須強求生產。小經濟合作均易如反掌。資源的分配不成問題，因為各國將大約就其資源所有而生產。國際投資不成問題，因為各國的生產於各該國於全世界將均為最經濟最有利的生產。國際勞工政策不成問題，因為各國將均有最大可能的生產量與最大可能的人工利用。國際貿易政策不成問題，因為分工的生產是各國相依為命的生產，多餘的製造品必有市場去吸收。國際貨幣及金銀政策亦只是技術的問題，無足深論。

反過來，如果戰後的世界仍無生產分工之制，其從方面的經濟合作亦決無實現的可能。因為各國都想維持或發展若干基本的工業，於是若干種原料將為各國所必爭。因為資本雄厚的國家不見得也是具備自給經濟各天然條件的國家，於是他們便不免想靠投資政策來操縱資源的分配以及市場的分配等等，於是授資政策便不免帶有帝國主義的色彩。因為工業前進的國家不見得是勞工充足的國家，於是工業落后的國家便不免利用較缺的勞工，以圖爭取市場，而國際勞工政策亦難樹立。因為各國均想自給，於是世上便有剩餘的製造品或農業產品，於是國際貿易永遠不能達到平衡的狀態。國際貿易不得平衡，國際貨幣及金融政策亦不得實現。凡此種種皆俱可說明生產分工制的存在實為國際經濟能否合作的關鍵。

有的人也許要說：我心目中的生產分工制，將大有利於大國，而太不利於小國。我的答覆是：如以自給與否為準，則分工制誠將有利於大國而不利於小國，但如以全人類最經濟的生產與最大可能的享受為衡，則分工制對大國小國並無一點偏私。固然，單位愈大，自給的可能性亦愈大。但各國之間既有完全的合作，則小國取給於異國的可能亦不外於大國的自給。如果說，分工制將有化零為整，提高大國制

的興發，則我誠有此用心。我以為人類政治經驗愈富，其政治單位愈大，愈能為人所接受。但一個過份龐大的單位，則計劃經濟愈可能。合理的計劃經濟只能實現於一個過份龐大的國家。從前的所謂國家計劃經濟只是倒足過度的經濟，徒然使國與國間的衝突尖銳化，而不能為國家的分子獲得永久的經濟進步。我們此時雖尚未達到實現世界國家的成熟時期，但生產分工之制如有促進各小國合併為較大的單位的功效，則我們又何樂而不令他發生此良好的功效？

我不否認生產分工是一個極高的理想。在民族與民族尚缺互信的今日，這理想或是不易實現的。邱吉爾三月二十一日的廣播曾經表示：「英國於今後的四年計劃內將注重農業。英國久已不是重農的國家。」他久已依賴自治領及其他國家供給他糧食水菓之類。苟世界無戰爭，以製造品交換農產品的辦法本來是於他有利的。但如有戰爭而他又遠對敵，則他的危險，是不言可喻的，邱吉爾的表示，就是說他不相信。

戰後世界通貨問題

伍啓元

在過去兩、三個月間，華盛頓與倫敦兩地同時進行聯合國家戰後幣制及有關問題之談判。此項談商最近已到達一個比較具體的階段，在四月五日美國財長摩根索正式提出他所擬訂的確定戰後通貨計劃，既已對戰後世界通貨問題提出具體的建議，則我國對這個問題也應及早決定自己的政策。本文的目的，一方面在檢討摩根索氏的計劃，方面在討論中國所應採取的政策。

摩根索的計劃，其主要內容為建議為戰後成立一國際平準基金，以黃金為基礎，在自由匯兌之原則下，確定各國之通貨價值，並產生三種與美元參照匯率的國際計算單位。據美財部所發表的消息，計劃書共包括六項原則：（一）確定之理定；（二）擬議中之平準基金，專就貨物在確定各參與國之通貨價值上，平準基金管理當局，將規定其

金後可以沒有戰爭。為佛戰起見，英國不能不求自給，也不能不重耕。他這種看法如來是今代的普遍看法，則分工制的理想自然尚難實行。然而我不信，邱吉爾的現實主義是多數明達人的態度。無論多數明達人如何看待，分工制與和平不可分離，正與自給制與戰爭之不可分離，應使今世希望樹立和平者歸於分工制的必要。故他的實行無論如何艱難，他的理想不能不提倡。以實行，今世六十餘國中，美國自然處於最有力的地位。他自給的天然條件向比任何國家為充足，而農工業的發達又在各國之上。故他如以身作則，不作完全自給的企圖，而以合理的生產分工為各國商議，則各國勢難拒絕其建議，勢難不唯他之馬首是瞻。但我們有當仁不讓，求其在己的古語。我們固缺乏領導的資格，但我們如亦放棄自給的企求，而力求生產分工的理想，如得中美兩大國的支持，則陳錢雖高，亦非無實行於今世的可能。這為談和平者所不可不有的信心。

實質各參與國通貨之價格，只有經過管理當局之許可，並為應付極端的情勢，匯率始得變動。匯率變動既須先經國際間之諮詢，則參與國間的競爭性之通貨貶值可以避免。（二）基金之來源——使通貨穩定能實現，平準基金須能在充分保障下應付參與國因平時交易而發生的對外匯的合法需要。欲達到此目的，參與各國至少應分擔基金五十萬萬美元；在開始時以黃金及政府證券交納一半。每國之分擔額，視其所持有作外匯用的黃金，國民收入，及國際支付額額的變動等因素而定。（三）取消匯率統制——在此計劃各項規定之下，各國單獨統制外匯之需要，幾已完全喪失。任何參與國不得採取統制匯兌之新措施。惟目的在制止不應有之資本流動者，得為例外，但亦須經平準基金管理當局之同意。各種複式通貨辦法及雙方面兌換算辦法，除經平準基金管理當局之許可者外，亦將予以禁止。平準基金當局將徵取各參與國

的資金，可以得到解封。（四）基金管理當局之權限——基金管理局有權賣賣各參與國之金幣，並經參與國之同意後賣賣其證券。○（五）新國際單位之產生——此計劃建議創立一國際黃金貨幣單位，命名為 *unite*，其價值等於美元一元。此種國際單位將為平準基金項目之計算單位，並不鑄造此種單位之金幣及不發行此種新單位之券票。但各參與國得將資金存於平準基金以換取新單位之信用，此種信用可以兌換成黃金並可在參與國間轉移。（六）基金之管理——基金由代表各參與國的董事會所管理。每國所有的投票權，依其資金（以國際單位計算）之貢獻而定，惟任何一國，其投票額不得超過總票百分之二十五。董事會之普通決定經多數通過生效，但特特決定須五分之四之通過始能生效。

凱恩斯的計劃與摩根索的計劃雖在目的方面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這兩個計劃是有許多重要的差別的。在目的方面，凱恩斯計劃有三點與摩根索計劃相同：第一、它們都代表一種貨幣的國際主義；它們都主張產生一種國際貨幣單位；第二、它們都提倡匯率自由主義；它們都建議取消匯兌統制，廢止雙方匯兌清算制度，和解除資金封存；第三、它們都以穩定匯率和避免競爭性的通貨貶值為目的。在機構方面，這兩個計劃都以為應樹立一種國際機制來主持戰後世界通貨的穩定與管理。但凱恩斯所建議樹立的是一個「國際清算聯合會」（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而非國際平準基金。這個國際清算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的理論根據，是「銀行的原理應用到國際方面」，其目的是以一方清算制度代替自由清算或雙方清算，因此與專以公開買賣通貨的方式去穩定匯率的國際平準基金的辦法是不同的。平準基金要公開買賣通貨，所以是需要資本的。聯合會只是一個清算機關，其資本與負債總是相等的，所以用不着由各參與國分担任何資本。聯合會擁有一計算單位——Bancor——其作用與摩根索的國際貨幣單位相似，它們都是一種信用的單位名稱（沒有貨幣或券票），它們都是與資金發生連繩的。但前者只與資金發生關係而不是以某一個國家的貨幣直接發生連繩為基礎的，同時它與黃金的比率是固定的，這當局有權賣賣各參與國之金幣，並經參與國之同意後賣賣其證券。

國家的貨幣直接發生連繩為基礎的，同時它與黃金的比率是固定的，這是不可改變的。根據凱恩斯的計劃，各參與國在聯合會正式成立前先用協商方式商定每國貨幣與國際單位（Bancor）的匯率，以後除匯率有正式變更外，各國的國際收入及國際支出均以其匯定匯率向聯合會清算。此種清算均應由各國中央銀行辦理。各參與國的中央銀行均與聯合會有往來帳，各國的對外收入與支出均分別記入此項帳上（以國際單位計算）之貸借兩方。從各參與國的立場來說，一國的國際收入超過支出時，它對聯合會即有一「貸方差額」；一國的國際支出超過收入時，它對聯合會即有一「借方差額」。參與國得以黃金存於聯合會以換取國際單位存款或有貸方差額而要求提取黃金。聯合會對於過大的貸方差額或借方差額都應加以糾正。聯合會應根據各國對外貿易數量決定各國對聯合會欠債的最高額或透支定額。在一國對聯合會的債務增至一定高額時，該國可以將其匯率加以調整，但此項調整非經聯合會管理當局之允許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在欠債額再進一步增加時，聯合會當局得要求該國給予聯合會以擔保品。如欠債額達欠債最高額之二半，則必須採取適當補救措施。如欠債額繼續作大量增加而在兩年內又無調整辦法則聯合會當局得宣告該國不能履後債務而不許其繼續真款。同時聯合會對於債權國存款的繼續增加，也應與其商討設法調降。最後，關於聯合會之組織與管理，凱恩斯主張聯合會應先由聯合國家組織（其他國家以後得請其加入），各參與國所有的管理權應統歸該國對外貿易數量而定。

站在世界的立場上我們認為消滅舊計劃所標榜的貨幣國際主義，應為自由主義，和匯兌穩定主義是應該為國際國家所接受的。我們想要在戰後樹立一個和平的世界，則在經濟方面非採取國際主義才可托付。摩根索的計劃和凱恩斯的計劃既都在貨幣方面主張國際主義才可托付，何要好和平的人對這兩個計劃的發表都應表示歡迎。不過我們必須瞭解，經濟國際主義是集體的和不平等的，因為它所管的國際主義當然是整個經濟國際主義的一部份然後才有被接受的機會。又這兩個計

都使貨幣的領導權操之於美國和英國的手裏這點是無足為異的。英國在接處這一類的建議，戰後的英美貿易合起來恐怕要佔世界貿易總額一半，因此他們將要較有經濟的領導權，是毫無疑問的。不過美國的經濟政策在經濟方面的領導世界，也在她們的算計的。在大西洋憲章中，就表示「希望維護世界和平」；我們認為這就是美英在國際方面的經濟責任。這種責任如要真正負擔起來，則美英等國必要向資本薄弱的國家發貸；一本新編的這些國家恢復平時經濟，一方面幫助這些國家完成工業化大業。或者我們可以說：這種對外投資與國際貨幣穩定計劃是互為條件的。資本薄弱的國家如要向美英借款，則美英為保障其資本的完全及促進其貿易的發展，必會以穩定匯率為條件的；同時美英如欲開拓各國穩定其貨幣，並使它們承認其貨幣領導權，則也須答應各國的要求，即資本輸給它們的。

從國際金融的觀點來看這兩個計劃，則這兩個計劃是各有利弊的。摩根索的計劃比較接近於此次戰爭發生以前中英美等國原有的「固定通貨率辦法」，即利用準備基金去穩定匯率的辦法，而凱恩斯的計劃則離開前各國所採行的辦法較遠；從人類的惰性來說，則摩根索的計劃是較易被人接受的。而且摩根索的計劃由美國提出，美國的金融、經濟力量現已超過英國，所以美國計劃或會較英國計劃易於被各國接受。不過如從純粹理論的立場來分析這兩種計劃，則凱恩斯的計劃似較摩根索的計劃為佳，這可以分兩點來談：（甲）美國計劃差不多像各小國把所有金融權力都讓給美英等大國；而凱氏計劃則對各小國的要求較小，並盡量保有各國對內金融措施的自由。（乙）凱氏計劃對債務權利的規定較為完善，它並把調整的責任分派給債權國，而債民的計劃有時可能產生若干具有收縮性的影響。（丙）凱氏的計劃不需多費本的，而摩氏的計劃是需要鉅額資本的。

大家不願接受凱氏建議，則我們主張採用摩根索的建議。但如這兩種建議都不被採用，則筆者在三月初一建議籌設國際金融合作的組織中所提出的較深遠的觀點，或者足以供給大家的參考。在那篇短文中筆者曾作這樣的主張：「我們主張國際開發委員會的建立。在那裏美英蘇他聯合國吧，彼此的賸兌率維持於一種穩定並易於計算的狀態。」其次，在金融（特別是短期資金流動、國際支付、及各種與物價貿易關係有關的事務）方面，我們主張各國中央銀行應成立一個永久的聯合局。具體地說，我們主張各國中央銀行應成立一個永久的國際所在地麻薩諸塞州，便過去各中央銀行各自為政的局面才能變成一種永久合作的局制。具體地說，我們主張各國中央銀行應成立一個永久的國際聯合委員會，以作各國金融政策的經常諮詢。然後各國對一切有關國際金融的重要措施，都應事先得到聯合委員會的同意。」（詳見評論，三卷十三期）總之，站在世界的立場，戰後在國際貨幣和國際金融方面應該有密切的合作並應設立國際的機構來主持合作的事宜。

站在中國的立場，我們對這次國際貨幣合作的各種計劃應該採取甚麼態度呢？我們認為中國在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樣應該贊成國際合作的最高原則。這有三個理由：（一）中國需要同大西洋沿岸和歐美的援助。英美現在既提倡經濟國際主義，則中國自然也應該加以贊助。（二）中國戰後工業化的大業如欲迅速完成，不能不靠美國英國及其他國際主義是有益於世界和平的前途的，所以中國應加以贊同。

但在中國接受國際穩定、貿易自由、和經濟合作的最高原則時，應提出一個條件，即由英美保證在戰後以大量資本、機器、技術人才供給中國，幫助中國在最短期內完成交通革命和工業革命。更具體的說，我國於接受摩根索計劃或凱恩斯計劃時，應同時建議在戰後成立「國際投資銀行」，由英美等國供給資本，這個銀行的使命一方面在負責各論區復興所需的長期資本，一方面在用貸款的方式幫助中國及其他需要資本的民族去完成其建國的工作。

自由主義派與當前之經濟問題

趙蘭坪

目前為統制經濟時代，人民衣食住行，一國經濟生活，均應置諸政府管理之下，方合世界潮流。大戰爆發以前，極權國家之一切產業，已由政府直接間接，加以統制，戰事爆發以後，一般經濟統制之更形強化，已成盡人皆知之事實。素尚自由之英美等國，為加強作戰力，量發展軍需生產計，對於人民之衣食住行，亦已先後加以統制，此種事實，更足以證明現為統制經濟時代，在此潮流之中並在長期抗戰之現狀之下，毋怪時賢力持經濟統制，主張將人民之經濟生活，均置諸政府管理之下，最低限度亦須將與戰時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之物俱加以統制，假如對於此種主張，認為尚有商討餘地，不免不合世界潮流。而為時代落伍之自由主義派之學說，是否錯誤？加以研究探討，似尚不致浪費篇幅。

一種經濟學說之成立，自有其時代背景，在此時代背景之中，自以經濟背景最為重要，一種經濟政策之產生亦有時代需要，在此時代需要之中，自以經濟方面之需要最為重要。奧密斯氏創導之自由主義，於政策方面，力主自由，認其私主有生產自由，營業自由，交易自由，財產之處分自由。勞動者則為自有人格自由，勞動自由。所謂勞動自由，即有自由處分其勞力之權，勞力之出售與否，固屬勞動者競爭自由。並云：「一切之干涉制度，立即取消，自然之自由制度遂行建立。在此制度之下，凡不背正義法律者，皆可隨其意之所欲，追求利益。凡以己之資本，己之事業，與他人之資本，他人之事業競爭，

者，當一任自由，不加干涉，此種極端放任自由之主張，流弊之大，自不待言。史密斯氏以來資本主義之積極發展，自由主義思想之極有力焉，資本主義充分發達之結果，為勞資階級之對峙，對外貿易本帝國主義之對抗，故在今日而經濟政策原題之抉擇，極端自由主義，已無探討餘地，而在當時則不然。英國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或產生除哲學方面之淵源外，尚有經濟方面之影響。蓋在自由主義以前，英國採行重商政策，對於國內工商業，國外貿易都極力與干涉，橫干涉。其最後目的，固在實現大國家主義，但其直接目的則在擴展輸出，增加金銀財寶之輸入，故於一方面積極獎勵人口之增加，他方面，凡能直接間接增加貨物輸出，誘致金銀輸入之工商貿易運輸各業，皆在獎勵之列，凡能直接間接增加貨物輸入，誘致金銀輸入之工商貿易運輸各業，均在抑制之列，實施結果，一經濟之大變態，不應謂通貨膨脹；二積極獎勵出埠製輸入，國內人民日用所需之物，如煤不足；三，人口日增，三者聯合，便使民窮財盡，無以為繼。現在當時整個國家，無論從政治方面，社會方面，人民智識道德方面，經濟本實施嚴格經濟統制之條件，俱未具備。在此狀態之下而對整個國民經濟生活進行全面統制，則其失敗殆無疑義，是以實行重商政策，勢與經濟生活所招致之惡果，一方面固力避於政策本身之錯誤，但另一方面則應歸咎於統制條件之尚未具備。在此情況之下，而欲解決當前經濟困難，唯有一反以前之全體干涉政策，而採取底自由放任主義，是故史密斯之自由主義，對於當時英國，既非無的放矢，人所亦云，更非迎合一般經濟思想之潮流，不顧本國事實之需要。不然，當

自由主義與當前之經濟問題

論。而對現代英國之經濟社會，或對其他國家之經濟社會，則有不盡。至其理由，則很簡單，蓋其經濟環境，早已不同，政治社會條件，亦多變更，易言之，經濟政策最富時間性與空間性。以前行之而見效者，未必可以實施於現在，本國行之而見效者。未必可以推行於外國。是以史密斯之自由主義，從現我各國之經濟社會觀察，已成陳舊落伍之廢物。而從當時英國之經濟社會觀察，則仍不失為一傑出之良方。準是而論自由主義之是非功過，須隨時代環境而轉移，未可一概論斷，不過史密斯氏於學理研究上之重大錯誤，則隨時代推移而益明顯。所謂重大錯觀者，一即忽視經濟科學之空間性，二即忽視經濟現象之構成，除物質條件外，尚有其他政治社會文化等非物質條件，此種錯誤，傾向自由政策者，固應引以為戒，非離自由主義，主張嚴格統制者，尤應加以注意。今按史密斯之著作既未明言經濟學理之有空間性與時間性，且其所作論斷，均從個人立場與世界立場。可見個人與世界之間性，未加注意。所得定律，當可認為行之萬國而皆準，至於時間方面，則僅指陳土地尚未私有資本尚未蓄積之古代社會，與土地已被私有資本已發蓄積之現代社會，此外更無經濟發展先後之不同，故除土地未私有資本未蓄積之原始社會外，一切經濟定律，均按之古今無不同。史密斯氏雖然忽視經濟科學之空間性與時間性，但未明白表示，而其淺見之後繼者，則更歸張揚厲，以爲史密斯氏以來研究所得之各論，時至今日，凡初習經濟學者，頗能信之。經濟學理之研究，尚須注意空間時間之差別，經濟政策之抉擇，更應重視空間時間之異同。史密斯氏未能注意及此，故可目爲史密斯之經濟學理上之重大錯誤。今之論者，似應加以深切注意。何則，經濟發展，本有先後之別，政策之施行，即須隨時代而轉移，行諸甲國而收宏效，行諸乙國而竟失效者，比比皆是。此即空間時間之不同環境需要之互異故也。論者忽

視此點，於學理上，即已遺漏自由主義派之史密斯氏之舊誤。又就經濟現象之構成條件而論，史密斯氏深受唯物論之影響，謂其他非物質條件，例如人民之風俗習慣，智識道德，歷史宗教，法律制度等，均在排斥之外。研究對象，遂局限於物質財貨，且以有形體之物質之財為限，但按我人之經濟生活，由生產以至消費，除物質條件外又受非物質條件之影響，且隨時代之發展，知識之進步，後者地位，日益重要，故如牛津制度之變更，可使一般人民之經濟生活為之改觀。風俗習慣之不同，足令生產與消費，受其影響。國家關係之強弱，可使產業組織，異其方式。督議產權水準之高下，能令一國經濟發展，有先後之別，此種事實，史密斯氏均未論及，實爲史密斯氏學理上之重大缺陷。今之論者，對於當前經濟問題之研討，似亦應物是視，凡此種種非物質條件，對於我人經濟生活有極大影響者，亦均置諸不足輕重之列，故其所犯學理上之錯誤，與史密斯同。

總之自由主義派之放任自由政策，其是非得失，可得二點：一、即就當時英國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條件而論，再就當時實驗先生生活需要而論，自由政策，實為對症之良藥。二、若就現在各國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情況而論，既就施行結果之弊害方面而論，澈底放任自由，早為環境所不許，且為事實所必無，基上二點，可知自由主義派之錯誤，不在自由政策之本身，而在後人不察，不顧經濟環境，不明事實需要，妄自引用譏諷耳。而自由主義派之真正錯誤，則在對經濟現象之研究，未臻健全。關於此點，亦可細別為二：一、即忽視空間性與時間性，故對政策之抉擇，既可不顧經濟發展之先後，又必忽視各國之特殊情形。一即唯物主義之色彩，過於深厚，遂未顧及構成經濟生活之非物質條件，而此非物質條件，各國不同。故其經濟生活，難期一致。自由主義派，未嘗注意及此，此其缺點也。基上二點，可知經濟學理之研究，經濟現象之敘述，尚須注意空間時間之異別，以及非物質條件之異同，否則決難明瞭各國經濟之真相，當前經濟政策之商討，其可不加註意，而與自由主義派犯同樣之錯誤乎？

坐井觀天錄

劉英士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其所見者小耳。所見雖小，然究不失其爲天之一角，是亦不可以不錄，乃作坐井觀天錄。

(一) 三而論

如果我的記憶還不算弱，關於戰時物價的抑制方式，我們先後已用四個字來加以描述：初用「評」字，各處都設委員會先評價；繼用「平」字，性質等於救荒時之平糧，是由政府貼錢來使公務員以六十元之代價，購得綢布一丈五尺；繼用「限」字，其效見於一疋紅燒雞的價格並不高於一碗家常豆腐；最後則用處士橫議的「議」字，現正開始實施。

由評價而平價而限價而議價，從文法上言，已經可用三「而」字。聽說上海一條冷靜馬路上有一家徽州館子，門口掛着「四而樓」的招牌，有人問其取義於胡適之。胡先生初不能答，繼而恍有所悟，反問來客曰：「會入該館一試否？菜價恐怕不低！」

商人好利，莫不抱着「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的希望。要是社會的力量不去加以控制，他們的討價，或不至於萬而不止。苟能認識此點，我們今當滿意於當局所曾表現之成績。其成績在抗戰將滿六年，物價降到三而。如果聽了自由主義者佛論，誰能担保戰時物價不依幾何級數而增加？

(二) 稿費該低

平均計算，稿費與排工，現約相等。有許多「君子自重」的著作家們，爲此頗抱不平。他們所寫的文章，也許就是「平等論」，但在內心裏面，總是覺得編輯先生該有一點階級意識，殊不宜對作家與排工，一視同仁。

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有種種解釋：

第一，價格之高下，常取決於生產成本。如今排工固羣居於茅廬

，作家也不復住洋房，排工吃的是半價米，作家吃的也不一定複合糧食；排工夏天也許赤膊，作家却是終年穿著破襪；排工苟出遠門，未始不能坐共汽車，作家也不一定能坐專車。無論是就衣食住行各方面來看，排工的生產成本都不低於作家，有幾位排工的生活，畢竟還比有幾位作家顯得。爲什麼他們的價格，一定要分出高下？也許讀人提出異議，以爲這是倒果爲因，倘使稿費提高一倍，作家的手腳活大一倍，那末，作家的生產成本，不就高上勝嗎？但這也可反過來論，理由並不體滿。

第二，價格的高下，亦取決於市場情形，供不應求則貴，供過求則賤。如果根據這種看法，更對作家不利。我見見過編輯市場常徵原稿退稿，從未聞有排工碰壁。

第三，價格之高下，亦取決於有關雙方之議價能力，同樣一個編輯，你去買花費千元，我去買打一九折，這就表示你還欠缺議價能力。排工已有同業公會，他們的定價非常劃一，絕對不許編輯先生與公商議。而作家則文人相輕，精神上沒有同業，互相競爭，你覺得我的稿費應比你低，我覺得你的稿費應比我低，很容易使編輯先生坐收漁利。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初版

當代論壇 第一期

每冊定價三元

主編者 劉光炎
編輯者 吳方仁 邱鍾蘭
發行者 聰文化編譯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利。

第四，價格之高下，也看季節、夏天的草稿，貴於冬天。如今紙貴洛陽，沒有多少篇幅來登文章。反之，通貨膨脹，印鈔票比印刷書報似更適合需要。

第五，價格之高下，也看商品週轉的速度。掛工所出的商品，遇

轉不息，而作家則於讀書二十年外，尚須等得到，誰能下筆？甚基此觀點，作家所得的稿費，除了彌補生產成本以外，尚須根據實率表，加上二十年以上的長期利息。此雖言之成理，却頗犯了短暫品奇之嫌，在這年頭兒，還是少心點。

梅蘭芳下鄉（代發刊詞）

黎光炎

梅蘭芳並不是天生只能在大舞台演繹的。把梅蘭芳關在大舞台是罪過。好戲人人愛聽，但有機會到上海的，能有幾人？到上海而湊巧買得到票子的，又有幾人？（因為票子有鐵市。）老實說，我就愛梅蘭芳的戲。幸而有幾次被老板居然騙騙我那時寄寓的南京，但是我仍然沒有一快眼福的機會。原因是：和梅蘭芳的跟包沒有交情，而笨口又不是熟人。

因為這樣，所以如果梅蘭芳下鄉，周游列國，在廣大農業之前，演奏他的拿手好戲，應該是怎樣一件空前盛事！

話歸本題，我們文化界的梅大王，也只寄住在都市。他們的美妙產品，幸道許多文化界的梅大王，也只寄住在都市。他們的美妙產品，由於交通的限制，也只有少數都市的人能享受。而散處在廣大發方的人們，遂不能不「百限望青天」老是夢寐的空虛。

尤其使人憤慨的是：雖然有這們多的名角，聚會在大都市。而大都市竟沒有為他們開設過所太舞臺。以重慶作例子吧，够得太舞臺資格的，不過三五家。而由於關係太多，不能不常常以「舞幅有限」、「積稿過多」等等地聲不好的理由，拒絕了梅蘭芳露面的機會。而在廣大後方呢？大舞臺遍地皆是，却「空空落燕泥」，寂寞得無人駐足。多麼矛盾而不合理的現象呵！

由於這許許多的理由，所以我們發了一個獎勵——「文化擂台」，把桂冠在大都市名角的改革，分給在後方各地的大舞臺上去。於是到了這「聯合文化總譯社」，向我們向渝見容。

我們希望這個「小舞台」，成為本社的「擂臺館」。

鹿